

本地特稿

炎陵的长沙郡主赵玉牒墓

叶常青

南宋长沙郡主赵玉牒墓,当地人俗称郡主坟,位于炎陵县沔渡镇苍背村黄烟铺的小山岗上,距离县城东22公里,毗邻S321公路和衡茶吉铁路。

赵玉牒,是宋朝徽宗皇后族裔宋诸王女、长沙郡主,是宋司马平阳侯尹鹏飞的原配夫人。后随夫尹鹏飞迁居鄱县霞阳留田(现在沔渡镇上)。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辞世。她死后,皇帝遣官员御祭,并按侯爵礼制立碑、碣。她的墓地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清乾隆十一年(1746)重修并立碑。该墓坐北朝南,呈老鹰捉兔的风水格局,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墓地正中曾立有石碑坊,两边列

有石狮、石马,墓前有三台九级拜堂,墓围用条石砌成。墓碑为青石质,碑文阴刻楷书:“宋司马平阳侯尹鹏飞翁元配长沙郡主赵玉牒之墓”。离墓地约300米远的地方,有“下马石”碑刻和“下马台”小地名。宋朝凡是墓前路过的官员都得下马祭拜。北宋绍兴二年(1132),岳飞攻打曹成部队,由江西进入湖南,路过赵玉牒墓地特地下马祭拜。2008年赵玉牒墓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炎陵县地方史志及姓氏族谱记载,炎陵县尹姓有两支,一是五代后唐年间,尹京担任衡山节度使,后裔尹鹏飞迁徙到霞阳留田,也就是现在

的沔渡镇上,其后裔多分布在炎陵县沔渡夏馆、十都大坪、霞阳草坪、鹿原沈湖;另一支是宋隆兴年间,尹祖盛从江西宁冈迁入霞阳洞,也就是现在的沔渡洞。尹鹏飞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部将,有军功,受封为平阳侯,后迁徙到炎陵沔渡镇上。现在,沔渡镇上馆村居住的100多户尹姓居民,均为尹鹏飞、赵玉牒的后裔,都尊赵玉牒为“良田开基祖母”。历次编纂的《尹氏族谱》都存有尹鹏飞、赵玉牒的画像及赵玉牒墓地位置图,而且尹氏后人每年都会祭拜赵玉牒墓。青山有幸葬郡主,一杯黄土掩风流。提起郡主墓,当地人发自肺腑的自豪

之情油然而生,溢于言表。

炎陵是老祖宗的安寝福地,因“邑有圣陵”炎帝陵而得名,是一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1994年版《鄱县志》载,炎陵县有古墓22处,古墓群23处。除了沔渡夏馆的长沙郡主赵玉牒墓外,还有鹿原镇霞阳村的南宋大理寺评事段升墓,霞阳镇霍村村的元末管军元帅段清远墓,霞阳镇草坪村的明代太仆寺少卿刘稳墓,等等。这些古墓,有的至今保持完整,有的虽然只有一截断碑或者一杯黄土,有的身世显赫,有的姓氏无存,但无论如何,都是炎陵厚重历史文化的见证和象征。

文史博览

秦汉的乡里社祭

李开元

“陈平分肉”的典故,是司马迁写进《史记·陈丞相世家》中的传闻故事,由这件小小的轶事,我们不但可以感受到陈平年少时的志向风采,更可以体会到秦汉时代乡里社会的乡土人情。

陈平是阳武户牖人。阳武是县名,户牖是乡名。当时的街巷,称作“里”,陈平所居住的里,叫作“库上里”,大概是因为靠近仓库而得名。

秦汉时代的乡,上承县,下治里,从户籍、税收、徭役、治安、教化、选举等各个方面直接管理乡内民户,是国家政权的末端组织,相当于现代中国农村的乡镇和城市的街道办事处。每乡的户数,由数百到数千户不等,平均一乡大概不到两千户人家。乡一级政府机构,设有乡啬夫,相当于乡长,负责一乡的行政事务;乡嗇夫有游徼,负责治安;有乡佐,负责徭役税收等,都是从国家领取俸禄的基层干部。秦汉的乡,还设有“三老”,即选取地方上德高望重的长者类人物出任,不取工资,免除他们的租税徭役,让他们引导民风、掌管教化,做连接官民的中介。

里是政府指导下的居民自治组织,户数从十户到百户不等,根据自然聚落的实际情况设置。一般来说,秦汉时代的里,特别是在平原地区,往往自成一个封闭的小区。里有门,白天打开,夜晚关闭;里有街巷,居民的住宅沿街修建,各家自有门户,大致相当于现代中国旧城区中加了的胡同巷子、农村地区圈上土墙的村庄。里有里正,为一里之长;下有十长、伍长,主管十户、五户人家;还有里监门,负责里门的开闭、看管。

不过,这些里中的管事人都不是政府官吏,而是居民中推举出来的协管,相当于城镇的街道居委会主任和农村的村长,以及下面的小组长一类角色。至于里监门,最是寒酸,不过是“小区”守大门的“保安”,由居民共同出钱,往往雇用那些穷愁无业、生活没有着落的人来担当。活跃于秦末的多位英雄人物,如张耳、陈馥、酈食其等,他们落难潦倒时,都做过里监门。

在古时社会,里既是社会的基层组织,也是居民的共同生活场所。在里民的共同生活中,社和社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社是土地神,来源于原始的土地崇拜。对于安土重迁的古人来说,社神是民间信仰的主神,社祭是乡里社会一年中的大事,春三月有春祭,祈求丰年;秋九月有秋祭,报告收成。祭祀社神,有固

定的场所,也称为社,往往选取有枝叶茂盛的大树或者丛林处,有的还建有土墙或者祠堂,筑有祭坛,称之为“社坛”。

里中祭祀社神,一里之人,共同参加。他们共同出资,预备酒肉食物,作为祭品献供。祭祀完毕以后,他们将祭品分享于众人,于是一里之人宴饮酒,神人同乐。远古以来,神人同乐的社祭,不但是乡里社会庄严的祭日,也是盛大的节庆宴乐。质朴的先民们,或者是杀鸡屠狗、扣盆敲瓶相和而歌,或者是宰羊椎牛、击鼓撞钟投足而舞。至于富商大贾们襄助的大社,鼓瑟吹笙,媮优百戏,更是盛况空前。

因为社祭是里中的大事,主持社祭的人往往是里正,或者是里中德高望重的长者。社祭是共同出资的公众活动,祭祀后祭品的分发零碎琐碎。如何能够公平合理,乐一里之人,最是操心费神,格外需要精明的人来周到处理。史书上说,库上里中举行社祭,祭祀后分发祭肉时,陈平被推举出来主刀,陈平分肉,公平得切,切合上下下利益,得到众人的欢喜。里中的父老对陈平评价甚高。

户牖乡距离陈留县(今河南开封东南)不远,东汉以来被编入东昏县,刘归陈留郡。东汉末年著名的文人蔡邕(女诗人蔡文姬的父亲),曾经为陈平主持分肉的库上里神社树碑,留下有《陈留东昏库上里神祠碑》铭文。

碑文中说,如今的库上里,就是从前的阳武户牖乡。秦国的时候,池子化做过丞相。汉王朝兴起,陈平在该社社宰分肉,后来辅佐高祖刘邦克定天下,出任右丞相。西汉平帝的时候,虞延出任太尉。东汉桓帝延熹年间,陈平的曾孙陈放出任尚书令。这些先后继踵的宰相们,都出身于库上里。他们的涌现,虽说是积德修身的政绩所致,也离不开库上里神祠的福佑之功。于是树碑颂德。

秦国丞相池子化不见于史书记载;陈平、虞延、陈放都源出于库上里。这种情况,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讲县城同一条街上,两王朝数百年间,涌现了四位总理,当是何等的荣光和神奇。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陈留一带,古来是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地方。

2008年8月,我为寻访陈留兄弟的踪迹走访陈留,在田间的玉米丛中寻得蔡邕的坟墓。蔡邕是陈留人,算是陈平的同乡,他为库上里神祠撰写铭文时,“陈留人杰地灵有风俗,库上里林深社福有传承”的古风旧貌,依然历历若在目前。

(本文原载《文史知识》)

史话

古人如何买卖房产

佚名



唐朝卖房“先问亲邻”

唐朝出台了一种持续一千多年的限购政策:“天下诸郡……有田宅产业……先已亲邻买卖。”也就是说,一切地皮和房产,想出手,得先问亲戚和邻居。

在古代,一切不动产在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都属个人与族人所共有,尤其是房屋这种由祖上遗留的产权,如果未经叔伯兄弟同意就出售,很可能伤害族人情感与利益。卖房先问亲邻的做法不仅能维护宗族制度的稳定,而且便于亲邻检举,进而有利政府控制每一户居民。

宋朝禁止京官在京购二套房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诏令:“现任京朝官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购置产业。”当时之所以出台这样的诏令,一是为限制兼并,二是为平衡住房供需矛盾,让老百姓有房可买。

现在政府出让国有土地用的是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宋朝同样这样卖地,只不过叫“实封投状”:朝廷公布地块和底价,有意向的卖家把自己能出的价钱写在纸上,装到信封里,投进朝廷指定的标筒,报价期间,朝廷开箱,出价最高者可买到地皮。

明太祖逼官员给穷人盖房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七年八月,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

旨,在龙江找一块闲置土地,盖260间瓦房,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后来,该政策又在上海(当时叫华亭县)推行。试点获得成功,朱元璋在全国复制“南京模式”。

只不过明太祖之后,各大城市的房价还是扶摇直上,朱元璋“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明清设“找房款”制度防炒房

明清时期没有人囤房,其原因就是有“找房款”制。简单来说就是,刚开始我卖房时卖了1万块,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房价已经涨到了5万块,那么我就拥有一次让你“找补”给我的房款的机会,即卖方向买方追讨过一部分房款,以补足商品的价格。

康熙六十年(1721年),江苏武进人刘文龙将自己的一亩八分地以7两银子的价格卖了出去,时隔8年,刘文龙以“原价轻浅”为由,委托终结向卖家“找”了1两银子,明清时,找房款现象屡见不鲜。

清朝为旗人建“经济适用房”

在清朝,经济适用房出现了,

但它是专门为特权阶层建造的。

清朝初年,大批旗人到北京定居。清政府让汉人搬到外城去住,在内城盖好了防止按品级分配给旗人。到乾隆年间,旗人越来越多。乾隆一方面继续给旗人盖房,另一方面开始搞房改:第一,国家不再免费分房(有特殊贡献以及跟皇室有特殊关系的旗人除外),旗人若嫌房子不够住,可向朝廷申请购买;第二,原本分到的房子可以卖,前提是得把它从国家手里买下来。于是,旗人花了很少的钱,把原本属于公家的房子,统统变成私人财产。

在清朝,不仅北京城里为旗人修建了海量的经济适用房,全国各地到处都有享受特殊优待的旗人居住区。以南京为例,当时明故宫至通济门的一大片区域都划给了满人。满族人聚居而居,因此南京人把这块地方称为“满城”。至今,在这一块区域,还留有蓝旗街的名字,顾名思义,当时这里是蓝旗旗人的经济适用房。

(文章来源《广州文摘报》)

时事聚焦

责任编辑/美术编辑:肖星平 校对:谭智方

中国已宣布向82国和世卫、非盟提供抗疫援助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2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向82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其中多批援助物资已经送达受援方。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提供的政治支持和物资援助。”耿爽说。

耿爽表示,当前,中国也在向遭受疫情的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主要正从四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在政府间援助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向82个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非盟提供援助,包括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其中多批援助物资已经送达受援方。二是在医疗技术合作方面,中国和世界各

国分享中国的诊疗方案,与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举行卫生专家视频会议,并向伊朗、伊拉克和意大利派遣医疗专家组。三是在地方政府援助方面,中国有关地方政府已向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城市捐赠了物资。四是在民间援助方面,中国的很多企业 and 民间机构已经开始为有关国家提供捐赠。

耿爽介绍了对韩国、巴基斯坦、意大利三国的援助情况。他说,中国政府向韩国援助了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20多个地方政府通过国际友城渠道向首尔、大邱、庆尚北道等地捐赠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检测试剂、测温仪等物资。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向巴基斯坦援助了检测试剂、口罩、防护服等物资,并将积极支持巴方建设隔离医院。中国

有关省市也向伊斯兰堡、卡拉奇市捐赠了口罩。

他说,中国政府和多个地方政府都向意大利援助了医疗物资,第三批医疗专家组即将派出。此外,中国丝路基金决定向意大利民事保护局和伦巴第大区政府捐赠2万只N95口罩、2万份检测试剂,第一批物资已经运抵意大利。

耿爽表示,很多中方对外提供的援助物资都写有寄语,既有“千里同好,坚于金石”等中国古语,“道不远人,人无异国”等韩国诗句,也有“我们是同海之浪,同树之叶,同园之花”等意大利哲学家名言,表达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加强抗击疫情国际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心声。



3月19日,在贝宁经济首都科托努,一名工作人员将中国捐赠的试剂盒取出。新华社(塞拉芬 摄)

中国与欧洲国家分享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经验做法



3月18日,在意大利帕多瓦,专家组成员与当地医生交流。新华社(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 供图)

50%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年龄在60岁以下,亟需借鉴年轻患者的救治经验。

欧洲精准医学平台首席执行官、免疫学家鞠丽雅注意到,武汉市18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实现“零报告”。她说,事实证明,大范围检测和

筛查疑似病例,实行有效隔离和救治,是遏制疫情蔓延的有效方法。中国经验值得欧洲借鉴。

她表示,一百多年前流感肆虐欧洲时,不同国家的医生只能独自与病毒作战。如今,中

欧专家虽相隔万里也能共享经验,这为早日战胜疫情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国的防控经验有很高参考价值

丹麦卫生与养老部国际合作特别顾问米德顿针对易感人群、中方防控措施效果、疫情发展趋势等问题同中方专家进行了交流互动。米德顿说,感谢中方及时、主动举办视频会议,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和做法。

瑞士联邦公共卫生总局副局长兼国际司司长洛尼希针对中方检测程序、检测试剂盒出口、疫苗研究进展等问题提问,中方专家一一予以解答。

爱尔兰国家病毒实验室主任西利安·德·加斯昆表示,感谢中方积极分享疫情防控与病患救治的宝贵经验,愿与中方进一步加强防疫交流与合作。

葡萄牙卫生总局国际合作负责人科雷亚说,感谢中方组织本次活动,周密的安排和会议环节设置令人印象深刻。中方的防控经验对葡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阿尔巴尼亚卫生研究院主任阿尔巴·菲科表示,阿尔医疗专家对中国采取传统中医和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很感兴趣,希望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能够进一步扩大。

全球抗疫物资短缺 多国借鉴中国企业“跨界”经验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一些国家和地区抗疫物资短缺的问题逐渐凸显,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尽最大努力”保证供应。同时,多国正借鉴中国一些企业转产医疗物资的经验,协调其制造企业转型生产呼吸机、防护服等紧缺设备。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例行疫情简报会上说,世卫组织已向68个国家运送了个人防护装备,向120个国家运送了150万新冠检测试剂盒,但物资仍然短缺。

“我重视个人防护装备和诊断工具,因为许多国家大量需求这些物资。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但未来物资短缺仍将是一个挑战。”谭德塞说。

谭德塞说,世卫组织正在寻求有关企业的帮助。他提到了中国企业的作用。谭德塞说,世卫组织正根据一份来自中国的协议供应商名单安排采购抗疫物资,目前正在敲定最后细节。

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在这次疫情中,中国有多家制造业企业成功“跨界”转产抗疫物资,引起广泛关注。比如,深圳企业比亚迪原本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与医疗领域“不搭界”。但疫情发生后,比亚迪迅速改建生产线,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实现口罩量产。如今,其口罩生产线和消毒凝胶生产线日产能分别达到500万只和30万瓶。比亚迪有关负责人表示,计划进一步提高产能,在满足国内口罩需求后,还将供应给疫情较为严重的国家。

外媒报道称,中国企业“跨界”的经验已经被多国借鉴,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协调本国制造企业转型生产呼吸机、防护服等医疗物资。

在疫情严重的意大利,著名汽车品牌法拉利、菲亚特克莱斯勒的工厂正在与意大利呼吸机制造商Siare讨论如何合作。据媒体报道,这些企业可能有两种合作方式:一是汽车厂为呼吸机工厂提供技术人员支持,帮助后者提高产量;二是直接利用汽车厂的设备制造呼吸机的一些零部件。呼吸机是挽救重症病例的重要设备,因此,汽车厂转产带来的呼吸机增产有望拯救更多生命。

在英国,一些航空航天设备制造商和汽车制造商已经成立了3支团队生产呼吸机,参与企业包括为民航和战斗机生产供氧系统的Megegit公司、汽车制造商麦克拉伦等。

欧洲飞机制造巨头空中客车公司也正在考虑利用3D打印等技术来快速生产呼吸机,也有消息人士称其目标是在两周内造出呼吸机原型,并在4周内投入生产。

在美国,通用和福特两大汽车制造商也正在考虑如何协助生产医疗设备。据媒体报道,通用汽车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已经与白宫有关人士商谈了有关事宜,福特汽车首席执行官吉姆·哈基特也在一场会议上表示正探索生产呼吸机的可行性。

不过也有一些制造业人士表示,“跨界”生产医疗用品没那么简单。比如,呼吸机生产商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其设计图纸等资源,可能会限制汽车厂转型生产的能力。另一个瓶颈是,传统汽车厂的生产环境可能经过改造才能满足医用标准。